

中医临床 理论思维探讨

曲峰 著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前 言

衡量一位医生医术水平高低，就是看他在临床实践中的疗效如何，能否使病人尽快恢复健康。而要有好的疗效，除了需要掌握医学理论外，还必须善于在总结临床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思维方法。有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诊断和治疗。

目前，在实现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广大医学工作者，以及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工作者，对中医学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从微观方面对病理、药理等进行实验研究；二是用中医传统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钻研和阐述；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探讨中医学理论思维的规律、特点和方法。这三方面研究对促进中医学发展都很重要。而对长期从事临床实践的大多数医生来说，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则更为重要。笔者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作一点探索和尝试。

1976年在农村医疗队期间，有机会学习了一点中医学知识。第二年回京后，一直从事中医研究生的自然辩证法教学工作。有幸在著名老中医方药中教授指导下，阅读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条辨》等中医学经典著作，较系统地旁听了中医研究生的有关课程，并随方教授临床见习一年。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方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和其他老师的大力帮助。尽管如此，由于本人毕竟是医学外行，

所论难免有不妥之处，以期得到广大医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批评指正。

在此，对方药中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其他老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1990.3

序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它有它固有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并直接指导着当前的临床实践，在保障我国当前人民的健康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并对世界医学显示出它的巨大生命力和普遍的影响。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问题，目前中医学学术界在认识上还不十分一致。我的认识是：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气化论”；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及生理病理认识是“脏象论”；中医学对病因及发病学认识是“正邪论”；中医学对病机学认识是“求属论”；中医学在临床诊断治疗上的特点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中医学的理论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物质基础是“候之所始，道之所生”。“整体恒动论”、“气化论”、“脏象论”、“正邪论”、“求属论”、“辨病与辨证”、“阴阳五行学说”，构成了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

在中医学“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气者，必彰于物”。理论源于实践，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的传统认识的指导下，两千年来，中医学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理论体系一直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同时又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临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养生防病的各种具体措施上更是代有发展。这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古老的，但又是年轻的。因此中医学也就永远充满了生命力和无限的光明前景。

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来看，一方面中医学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仰观天，俯察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医学固有的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又接受和运用了古代的先进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和当时的多学科知识，来阐发自己的理论认识和临床实践经验，因而也就使得中医学理论和实践与当时的先进哲学和科学认识统一认识，并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因此，我们在今天如何运用现代的哲学和科学认识来对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作进一步的阐发，使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与现代的哲学和科学认识同步，统一认识，使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能在固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不断发展，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现代哲学和科学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和不可推卸的艰巨任务。

我的朋友曲峰同志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现代哲学工作者，多年来，她十分关心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她系统学习过中医理论，也曾随我从事过临床工作，我们是益师益友，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我们经常在一起互相切磋，她对中医理论和实践有不少卓见之处。最近，她撰写了《中医临床理论思维探讨》一书，送我审阅。我读了一遍，深感本书内容翔实，确有特点。本书特点是：

其一，本书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阐述了中医学和哲学的关系，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古代哲学在中医学基础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医学发展对哲学的影响，同时对中医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涵进一步从理论上作了概括。

其二，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中医学辩证思维与临床实践结合起来，分析概括得较全面，对指导临床很有意义。

其三，对中医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书中认为，“把中医学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遵循中医传统思维的特点，着重用综合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医，是实现中医理论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些见解值得重视。

阅读之后，曲峰同志索序。我对现代哲学半解一知，实不足以博大雅之一粲，何敢言序？但思及此书出后，有助于使中医学理论逐步提高到现代哲学水平，对于提倡中医及中医现代化大有裨益，因此欣然命笔，并诸篇首，以示所见略同，并表支持之意。

方 药 中

1989年元旦

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中医学和哲学	1
一、古代哲学与中医学源流	1
二、中医学中的哲学及其影响	9
三、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加强中医学理论研究	16
第二章 气化万物的唯物论	21
一、“气”概念的来历	21
二、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	24
三、天地合气而生人	27
四、人与天地相应	30
第三章 阴阳离合的矛盾论	37
一、中医阴阳学说的思想来源	37
二、对阴阳离合论的分析	41
三、阴阳离合论在诊疗中的应用	47
四、对阴阳学说中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	48
第四章 五行生克的系统论	53
一、五行学说的历史演变	53
二、对五行生克的分析	55
三、五行生克在医学中的运用	59
第五章 生化不息的运动观	64
一、升降出入，无器不有	64
二、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	68
三、阴阳相错，变由生	71

第六章 形与神俱的形神统一观·····	75
一、形神关系考·····	75
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77
三、形与神俱，尽终天年·····	80
四、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	81
第七章 脏象学说的辩证法·····	83
一、整体与部分·····	83
二、结构与功能·····	88
三、本质与现象·····	92
第八章 正邪理论的辩证法·····	96
一、正邪辨析·····	96
二、正邪与发病·····	98
三、正邪与治疗·····	100
四、正气为本的内因论思想·····	101
第九章 四诊与辨证的认识方法·····	104
一、天道无私，虽远可知·····	104
二、候始道生与四诊合参·····	107
三、辨证及其逻辑方法·····	111
第十章 治则中的辩证法·····	119
一、防治结合，重治未病·····	119
二、三因制宜，具体分析·····	121
三、病有虚实，治有补泻·····	124
四、标本缓急，治各有次·····	125
五、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127
六、症有真假，治有逆从·····	129
七、五脏相袭，治此达彼·····	131
八、邪有盛衰，掌握时机·····	133

九、病有轻重，微调盛夺	134
十、中病则止，治养结合	135
第十一章 方剂学中的辩证法思想	137
一、主次分明的组方原则	137
二、注重联系的配伍规律	140
三、药物增减的灵活方法	143
第十二章 中医养生学说	146
一、法阴阳，应四时	148
二、舒气血，调情志	152
三、合动静，适劳逸	156
四、保天真，节房事	159
五、重饮食，护脾胃	161
第十三章 中医心理学说	166
一、中医学对心理特征的认识	167
二、对认识过程中心理活动的认识	170
三、关于发病中的心理因素	172
四、关于诊断治疗中的心理因素	174
第十四章 中医伦理学说	180
一、中医学伦理思想的特点	180
二、中医学的道德规范	184
第十五章 中医研究的方法论及中医学的现代化	190
一、人类认识方法的辩证发展	190
二、目前中医研究的两种思路	195
三、中医现代化的近期目标	202

第一章 绪论·中医学和哲学

中医学是我国优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民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至今仍象一朵灿烂夺目的鲜花，盛开于科学百花园之中，以其独特的风姿，引起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注目。中医学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以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指导，不断总结医疗经验，吸收其他科学成果，较深刻地反映了人体生理病理的本质，其理论体系具有深厚而坚实的哲学基础。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是，在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其理论和文献中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些历史缺陷和封建糟粕，因此，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考察中医学和哲学的关系，研究中医学理论思维的特点，这对于指导中医临床实践，实现中医学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代哲学与中医学源流

中医学起源于生活实践，是我国人民同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中医学在对医疗经验进行总结的时候，同一切自然科学一样，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而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这些逻辑范畴既不是人们头脑中生来固有的，也不能和普通日常意识一起获得，而是从哲学中取来的。任何自然科

学都和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生动地说明了这个真理。

据史书记载，很早以前，我们祖先在同疾病斗争中就对某些疾病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些经验。如“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就反映了我国医药学起源的久远。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发展，人们对疾病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有了进一步认识，医和关于“六淫致病”说还试图从理论上予以说明。到了战国中期及至秦汉，《黄帝内经》问世，中医学理论体系已基本形成，为中医学后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医学这一划时代进步，同当时哲学思想发展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战国时期，我国新兴封建制度确立，推动了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在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思想界存在着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许多学派，其中从老子创立的道家中分化出来的黄老之学，由于“与时迁移，应物之化”，适应了由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得到了迅速发展，对各家产生了巨大影响。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庄之学，它属于道家的左派，它假托黄帝以自重，吸收各家之长，对老子思想加以唯物主义改造，成了战国末至秦汉的主导思想。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黄老道家的学说作了如下概括：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散，形神离则死。”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中前期，兴于齐国稷下，盛于秦汉。现

存《管子》中的《内业》、《白心》、《心术》等篇，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老帛书》，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都突出地体现了黄老道家的这些基本思想。中医经典文献《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就是在黄老道家直接影响下，采取黄帝与其大臣问对的形式，在总结医疗经验基础上写成的。《内经》中关于气化万物的观点，关于以阴阳为纲纪的观点，关于五行生克的观点，关于人与天地相应的观点，关于形神统一的观点，关于生命起源和养生之道的观点，都是从黄老哲学中脱胎出来的。可以说，黄老之学始终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

两汉时代，中医学进步的集中体现，就是东汉末年张仲景写的《伤寒杂病论》。仲景这部医学名著把《内经》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对病因和病机进行了探讨，对药物方剂也开展了深入研究，把辨证论治原则系统化，使中医学理、法、方、药成龙配套，开始步入了一条健康发展道路。这些巨大成就的取得，同当时唯物主义哲学影响不无联系。东汉时期，大哲学家王充发扬黄老之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称黄老是“贤之纯者”，认为“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其唯一不足就是“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他总结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成就，运用“元气”解释天地万物和人的生成变化，对于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以来风靡于世的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进行了尖锐批判，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张仲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事医学活动的。据史书记载，张仲景除了撰有《伤寒杂病论》医学专著外，还有《庄子讲疏》、《游玄桂林》、《玄书通义》等哲学著作，可惜这三本哲学著作早已散失。但是，从《伤寒杂病论》的序中仍可窥见其基本哲学倾向。仲景同情当时遭受战乱和疾病之苦的劳动人民，他

痛斥一些人“竞逐荣势，企踵权豪”，而遇有疫病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的丑恶行为，认为“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完全是舍本求末。对于一些庸医“各承家技，终端顺旧”的保守思想也提出了批评。正是在这种“举世昏迷，莫能觉悟”的情况下，他奋起直进，“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医疗经验，完成了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序中说：“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这几句话寓意深刻，哲理性很强，既是对《内经》哲学思想的精辟概括，也是《伤寒杂病论》把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结合起来，从而确立辨证论治原则的根本指导思想。可见，张仲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临床医生，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理论家，他之所以能写出《伤寒杂病论》，这是同他接受王充哲学的启迪，以及自己在哲学方面深有造诣和素养分不开的。

魏晋至隋唐，中医学在医疗实践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在认识疾病、诊断治疗、创制医方和发现新药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这个时期中医学的最大特点，是流于方剂经验的搜集整理，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因而发展比较缓慢。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唯心主义玄学和宗教迷信的直接干扰。魏晋之后，何晏、王弼力倡“以无为本”的玄学。这种玄学同佛教“般若”空宗融为一体，又和道教“服石”成仙合而为一，在社会上层煽起了一股崇尚“清谈”、“倾心”“通脱”、嗜酒放荡、乞求不死。修仙升天的腐败风气，使医学几乎沦为神学的婢女。

比如，医学家葛洪曾著有《肘后救卒方》，所用方剂多是“易得之药”，“皆贱价草石”，对于乡村穷苦人及时治疗一些急症很有意义。他从事炼丹，对后来化学的诞生也有一定借

鉴作用。但是，他深受道教神学的影响，长期热衷于寻求不死成仙的灵丹妙药。他著的《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和《隐逸传》等，都是宣传神仙方药、攘邪却祸、鬼怪变化一类道教思想，以及人间得失，世事臧否的道德说教。他醉心于荒诞无稽的宗教迷信，对人生抱着一种及时行乐的颓废情绪，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医学方面有多大作为。

再如，医药学家陶弘景学识渊博，“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图产物，医术本草”。医药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名医别录》及《本草经集注》。后者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一部药典。他使《神农本草经》原载的 365 种药物翻了一番，在药物分类方面也作了改革。他创造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方便了人们学习和应用，被后人沿用了千年之久，今天的中药分类法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些成就却是为他所信仰的道教信条支配的。如在《本草经集注》的自序中说：“隐居先生在乎茅山之仙，以吐纳余暇，游意方技，览本草药性，以为尽圣之性，故撰而论之。……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兼注诏时用土地所出，及仙经道术所需”。可见，陶弘景既是一位“览本草药性”的药物学家，同时又是一位适“仙经道术所需”的真品道士。他著的《真诰》七篇专言神仙授意真诀之事，《养生延年录》主述长生不死之术，白白耗去了他大部分才华和精力。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类似葛洪、陶弘景这样的“杰出科学家而渺小哲学家”不在少数。就是唐代名医孙思邈既“善谈老庄”，又“兼好释典”，既相信“禁咒法”能以治病，又认为有子无子也同“夫妻本命”有关，甚至强调只有“精熟”和“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才能算得上“大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表现了浓厚的神秘色

彩。

宋明时代，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对当时医学影响很大。理学中的唯心主义，以周敦颐、邵雍、程颐、程颢、朱熹等为代表，从“理在气先”的基本立场出发，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宣扬一种变相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理学中的唯物主义，以李觏、王安石、张载、陈亮、叶适等为代表，坚持和发挥秦汉以来元气化生万物的观点，探讨了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批判。宋明时代中医学发展，与理学中这两条哲学路线密切相关。

北宋时期，由于官方唆使，一些医者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邵雍的唯心主义象数学，同《内经》中的运气学说结合起来，使五运六气学说走向极端。他们依据对流年周期气候和病理变化的推测去选方索药，使魏晋以来只重方剂搜集而不重理论研究的弊端继续发展。如北宋末年，曹孝忠主编的《圣济总录》，全书二百卷，二百多万字，以病分六十六门，收集药方近两万，理、法、方、药俱全，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北宋的医学水平。然而，五运六气学说的机械模式贯穿全书，使这部著作在理论上带有神秘色彩，因而大为逊色。同时，许多医者因恪守《局方》教条，不求医理，也养成了一种因循守旧恶习，在医疗中离开辨证论治原则，结果滥用温燥，虚实错谬，可谓遗害非浅。

南宋末至金元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一些富有民族气节的医家接受王安石、张载等人的元气唯物主义影响，同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学风相对抗，在医学理论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先后涌现出一批勇于创新的学派。当时出现的主要学派有：刘完素代表的“寒凉学派”，李东垣代表的“补土学派”，张从正代表的“攻下学派”，朱丹溪代表的

“养阴学派”，也即人们通常说的金元“四大医家”。这些学派总结各自临床经验，从不拘角度对中医理论进行了创造性探讨，都对中医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哲学思想方面，他们恢复和发挥了《内经》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传统，并在事实上以医学论著介入了当时理学中两条哲学路线的争论。他们的哲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坚持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认为“天地以一元之气化生万物（朱丹溪：《格致余论》），气是“形之主，神之母，三才之本，万物之元”，“非气不足以生长万物”。（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程、朱理学关于“理在气先”，把“理”视为“生物之本”，“无理便无气，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的唯心主义观点。

②承认阴阳二者相辅相承，互为存在条件，“孤阴不长，独阳不成”，所以“观夫医者，唯以别阴阳虚实为枢要”（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阴阳概念是对一切相互对立的事物和倾向的概括，“所指无定所”，对于疾病的“寒热阴阳”必须善于作具体分析。他们不赞成一些俗医泛泛地搬弄理学唯心主义的“道之阴阳”，“易之阴阳”，以及“修养家之阴阳”，去推演疾病的寒热阴阳。

③一般都肯定运气学说在中医学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医家之要，在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们主张的运气学说不是大运统岁、客气加临的机械观点，而是以阴阳五行的观点去研究四时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五运联属五脏，以六气联属病机，紧密结合脏腑辨证、病机转化，以指导临床实践，打破了时序和疾病关系的固定模式。他们反对宋代以来一些医者用理学唯心主义去演绎《内经》的运气学说。刘完素指出：“观夫

世传运气之书多矣，盖举大纲，乃学之门户，皆歌颂铃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况非其人，百未得于经之一二，而妄撰运气之书，传于世者，是以矜己惑人，而莫能彰验，致使学人不知其美，俾圣经妙典，日远日疏，而习之者鲜矣。悲夫！”（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

④关于人性、人命的问题。金元医家都承认人禀天地之气而生，并力图以五运六气学说解释自然气候变化对于人体健康的影响。但是，他们很重视后天养生和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刘完素强调指出：“主性命者在乎人，去性命者亦在乎人，养性命者亦在乎人，修短寿夭皆自人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他们主张“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专气抱一，神气相合，节制嗜欲等来固形和全生。他们不欣赏程、朱理学关于人“性即是理”，人性善恶由先天禀受气之清浊所决定的宿命论，以及“存天理而灭人欲”的禁欲主义。

金元四大家由于接受了理学中的唯物主义影响，坚持理论和医疗实践结合，对医学理论进行了大胆探讨，相互借鉴和辩论，因而他们或者主“寒凉”，或者主“攻下”，或者主“温补”，或者主“养阴”，都各有所长，在中医学治疗火热病方面，都取得了异曲同工之效。

但是，金元四大家对于理学中两条对立的哲学路线并没有明确的辨别，他们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抵制和对理学唯物主义的接受，主要是立足于自己的临床实践，在理论上并不是自觉的，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借用了程、朱理学的术语，甚至还直接引用其言论去阐述自己的医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的是朱丹溪。丹溪早年曾就学于朱熹四传弟子许白云，深受程、朱理学熏陶，其主要著作《格致余论》，“格致”就是理学家“格物致知”的简称。丹溪用“格致”贯串全书未必象程、